第 一 章

绪 论

中国西部地区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辉煌厚重的文化底蕴。但自唐后期特别是宋代起，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此后愈益向东部特别是东南地区发展。作为偏僻闭塞、交通落后、地理位置处于劣势的西部地区，其政治、经济、文化在泱泱大国中的地位大为衰落。然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却正由于其落后与闭塞及地理位置的劣势，使日寇鞭长莫及、无欲西进，始终未向西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的陆军进攻和占领。中国文化重心得以在东部遭受摧残后艰辛西移，在西部地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以抗战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进步文化在西部地区保存、衍生并空前繁荣、发展。

一、源远流长：西部文化的兴盛与衰落

(一)源远流长的西部文化

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广袤神奇的西部大地作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曾经有过丝绸之路、秦汉雄风、盛唐气象等辉煌灿烂的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礼州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已生动地反映着西部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秦汉以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在这一地区广泛交汇，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至盛唐可谓登峰造极，由此而有佛院深寺的暮鼓晨钟、丝绸之路的车水马龙，敦煌莫高窟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既具兼收并蓄的恢宏气度，又有精美绝伦的艺术形式，还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西部地区还有世界瞩目的秦陵兵马俑、西夏王陵、楼兰古国、交河古城、布达拉宫、大昭寺、三星堆、大足石刻等历史文化遗存，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西部地区是中华远古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先祖的出生地。陕西的半坡遗址、黄帝陵、甘肃的大地湾遗址、伏羲庙，都可佐证。除丝绸之路流传千古、中外驰名外，中华民族还在西部地区写下了文景之治、大唐盛世、中西交流等等弥足夸耀的辉煌篇章。曾几何时，西部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集萃地。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的民间歌舞、戏曲、剪纸、刺绣、民居、岩画和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宗教艺术等等，有如一个巨大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宝库。此外，东巴文化、吐蕃文化、西夏文化、于阗文化、金文化、大理文化和黑汗文化等，都曾在文字学、文学艺术、哲学、建筑学和文化制度方面取得过民族文化史上的辉煌成就。西部还曾产生过雄视中外的盛唐之音和豪放雄奇的边塞诗歌。

历史雄辩地证明，西部地区在中华民族的形成阶段，在我国文明的开创和发展时期，都曾发挥过十分巨大的作用。西部文化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落后，而是曾经相当先进，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

西部一些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历史上也曾相当发达。汉代的陕西、四川，唐代的陕西，宋代的四川，杰出人士众多 陕西、甘肃唐代所出的进士居全国前 10 位；宋代四川进士众多，故宋代的四

川哲学、文学、史学十分发达。这些时期西部地区社会经济也仍是相对发达的时期。

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史，还流传着许许多多为民族生存发展、为国家繁荣昌盛而竭力奋斗或苦心经营的动人故事，从传说中黄帝族在大西北开始建树其开天辟地的伟业起，接连不断的如穆天子驾骏西游以探险；秦皇实边、汉武遣使、唐宗和亲，以筹建或维护一个统一、繁荣的王朝 蒙恬、张骞、班超、裴琚、左宗棠等经略西部的惊人业绩，都为西部文化留下了一笔笔浓墨重彩。而这一切都显现出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二)光彩夺目的文化史章

翻开西部文化史可知，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道路上，曾出现过三次鼎盛局面，而第一次、第二次分别是西汉和唐朝。换言之，建都于西部地区长安（西安）的西汉、李唐两朝，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文化相当发达的鼎盛时期，它们除了有丝绸之路、敦煌文化及昭君出塞、唐宗和亲等举世闻名的文化奇观和千古传诵的文化故事外，还有其他许多文化亮点。

西汉司马迁(陕西韩城人)之《史记》,凡 130 卷,是一部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左右历史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创造了历史纪传体新体裁，为此后两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典范。汉武帝命司马迁等人编制的《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汉武帝时还出现了中国第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它记载了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从而使人们认识了勾股定理。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

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在长安主持改定历法,在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经线），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恒星

位置变动的天文学家。唐初医学和药物学家孙思邈所撰药书《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在中国药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被后人尊称为“药王”。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的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印本。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书中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强调秉笔直书，对后世治史发生了深远影响。唐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由逐条解释律文而成的《唐律疏义》30 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唐中后期杜佑的《通典》，则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唐代古典诗歌亦处极盛时期，《全唐诗》辑录诗歌近 5 万首,作者达 2200 余人，不少名篇佳作历久不衰。特别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留居川、陕期间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杰出诗篇。唐代四川乐山的石雕凌云大佛坐像，高 71 米,肩宽 24 米，仅一脚趾就可坐四人，是我国最大的石佛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石雕，它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家的高超才华和中华民族的崇高创造精神、巨大创造能力。此外，昭陵“六骏”、三彩陶俑也都是唐代杰出的、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石雕艺术珍品。唐朝天宝时，由“婆罗门曲’改称的‘霓裳羽衣舞”,则是中印乐舞融合的最高成就。当时世界文化交流中心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而这三个中心又以中国的地位最突出，中国又以长安为与各国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城市。

此外，在其他朝代，西部地区也有许多文化上的闪光点。建国后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了刻划着示意符号的陶器和陶片，这些符号在文字学上称为“陶文”。它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这说明西部地区很早就与祖国汉字的产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早在建都镐京（今西安市西）的西周时，就专设掌管天文历法

的官职，并于公元前 776 年记载了世界上最早一次有明确时间的日食记录。战国时期四川灌县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和陕西关中的郑国渠，堪称同时期世界水利建设的杰作，说明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高水平。东汉班固（陕西扶风人）的《汉书》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共 100 卷 80 余万字。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和库木吐拉千佛洞，是我国石窟艺术首创时期佛教及其艺术经由新疆传到内地的见证。前后秦时，长安是北方的佛教中心，到十六国时期关中佛学达到了最高峰，大和尚佛图澄的法术、名僧释道安的传教、原籍天竺后到长安的鸠摩罗什的译经，为我国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基础。从北魏时起的甘肃敦煌石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等，代表了当时中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宝库。隋炀帝时著名地理学家裴矩奉敕去甘肃张掖、武威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丰富的西域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地理学名著《西域图记》三卷等等。

中国古代史上开发西部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其人可钦可佩，其事可歌可泣。如前所述，许多人已名扬中外、流芳古今，但也有的鲜为人知、亟应彰颂。人们都知道“文章西汉两司马”的美誉，却很少知道“两司马”开发大西南的故事。这里的“两司马”自然不是指古代的官职，而是指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这两位旷代奇才。人们知道那个大辞赋家、琴瑟和鸣、当垆卖酒、与美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的司马相如，知道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让其“太史公”的美称誉满华夏的司马迁。却很少知道这两位大文学家、史学家为开发祖国大西南而建功立业的不朽史迹。张骞、班超经略大西北青史标名、万人仰颂，两“司马”开发大西南却鲜为人知，司马相如以华美文辞撰就了《谕巴蜀檄》安抚西南民众，又以一篇《难蜀父老》的辩难文章，力陈‘沟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受到汉武帝赞赏，委之以全权处理“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迁则以汉武帝侍从官的身份出使邛、笮、昆明等地，代表西汉政府安抚该地民众，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有了在西南边疆的丰富阅历，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他们开发西南及西南地区的一些情况作了详细记载。

林则徐、左宗棠开发西部虽为世人熟知，但自五代十国、宋元明以来西部开发几近停滞，在清代再度掀起开发西部热潮后的众多封疆大吏中，作为忍辱负重、受贬谪、遭流放的林则徐，和临危受命、反侵略、图开发的左宗棠，仍值得我们纪念和提及。

戴罪遭谪的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经西安时就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闯祸福避趋之？”[①]他虽以罪臣身份，却仍念念不忘为朝廷分忧，为庶民出力。他带领新疆人民开荒屯田、兴修水利、强边御俄、赈济灾民。他“西域遍行三万里”，心系民众，体恤疾苦，为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南疆出现了“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的繁荣景象。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伊犁的同时，以远见卓识，致力西北开发。他禁种鸦片，倡种稻植棉；他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畜牧、种桑养蚕；他大兴军屯、开垦荒地；他兴办近代工业，开发西部资源；他兴修水利、筑路建城。尤其是他在植树造林、改造大漠荒凉环境和重教兴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功绩，更为世人称道。“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②]就是人们对他造林功德的高度赞扬。在兴办教育方面，在甘肃一省他就修复了 20 多所书院，他还把军费“挪用”到教育上，以发展各地书院。为解决甘肃考生无力赴陕赶考的问题，他奏请朝廷准许在甘肃分闱乡试。

①林则徐：《越戌登口占示家人》，转引自《中国西部大开发丛书·历史的机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 页。

② 《中国西部大开发丛书·历史的机遇》，第 68 页。

为此，在兰州修建贡院，规模之大，各省罕见。为解决贫寒孩童入学问题，他令各府州县兴办义学，并坚持以自己的津贴薪水周济学生。他在西部开发时重教兴学的认识和实践，对今天西部文化开发仍有重要启迪。

（三）西部文化的渐趋衰落与重振雄风

综上可见，西部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沉的积淀，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文化传统。

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近一千多年来，由于气候地貌、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和人口、战乱等社会因素，自元明清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地位却急剧衰落。早在唐朝经安史之乱，唐王朝逐渐衰落，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就已渐缓慢，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也就随之相对落后。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西部地区的地位也随之下降。由于民族阻隔，加上生态环境恶化，河流改道或断流，沙漠化加重，丝绸之路一度受阻。同时，由于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路日益繁荣，逐渐削弱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地位。在西南地区，四川的经济地位曾十分重要。但宋在四川划大流河与大理为界，偏安一隅，政治上在西南的气度已大不如前，南宋末年和元代末年的四川战乱，使四川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明代后期关闭嘉峪关，也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多有负面影响。因此，明清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差距日益拉大，西部地区地位不断下降。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教育落后，文化发展也随之缓慢，新的文化亮点、热点极少出现。

然而，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地区却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旷世奇观，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西部文化重振雄风，再现昔日风采。其深刻背景在于：由于日寇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使中国文化遭到空前劫难，而首当其冲备遭洗劫的是由

北向南的中国东部地区。为了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精华，东部广大沦陷区的大量著名高等院校和文化教育机构、设施、团体及进步师生和文化名人，历尽艰辛，先向南后向西纷纷迁移。由此而在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重心西移，形成了以延安和重庆为代表的包括桂林、昆明、西安、成都、贵阳、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等地在内的辐射西部广大地区的以抗日爱国为主旋律的进步文化蓬勃发展局面。被迫内迁西移的广大进步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克服困难，冒着危险，潜心文化，服务抗战，纷纷著书立说、出刊办报、唱歌演戏、吟诗作画、办校育人、授课演讲……以各种形式为抗战奔走呼号并开展大量新的进步文化建设。由此而使西部地区出现了抗战文化繁荣活跃的旷世奇观，并在中华文化史上首次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独特文化格局。

二、日寇野蛮东侵与文化艰辛西移

(一)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抗战期间，日寇疯狂侵略中国东部地区，以暴虐、野蛮的手段，对中国大中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实行轰炸、纵火、劫掠，极尽摧残破坏之能事，极力毁灭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给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造成深重的创伤。

日寇对中国文化摧残之烈和创伤之重首推中国教育事业。据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上递交的报告书中所指出的：“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智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

化。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是惊人。”①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开始肆意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九一八事变时，全东北有小学 14330 余所，相继被日本强行封闭或占用，中学教育在东北发展得很缓慢，仅有学校 194 所。事变后，侵略者大肆摧残破坏中学，许多教员和学生遭到逮捕、监禁或屠杀。事变前，东北的 30 余所高校，全部被日寇强行封闭。②

一二八事变后，淞沪沦为战区。密集沪市的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③如坐落在江湾路的上海法学院，新建房屋为日军纵火焚烧，经两昼夜全部被毁，所有公私财物均付之一炬。在炮台湾的中国公学也被焚毁无余。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大夏大学等 14 所高校在日军侵犯中所受损失共达 7438187 元。④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数月，日本侵略者又一次掀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的狂潮。 1937 年 7 月 29 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目标集中于南开大学，至 8 月 1 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⑤ 半个月后，日军把战火烧向上海。出动 100 余架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有 92 所文教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遭全毁的占 75%。⑥ 自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起,两个月内,日机对中国 61 座城市实施了轰炸，特别有意识地

①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9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太行学苑》·1998 年第 1 期,第 49 页。

③ 《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④ 《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⑤ 参见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159、161 页。

⑥ 参见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159、161 页。

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如南京中央大学自 8 月 15 日至 26 日就三次遭日机袭击。①

为避战火，大批高校不得不西迁。然而，西迁高校及内地高校仍遭日机轰炸。长沙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 1938 年 4 月 10 日遭 27 架日机的轰炸，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该校旋迁湘西辰溪，又遭日机两次轰炸。② 浙江大学多次西迁，日机仍然跟踪而至。1939 年 2 月 5 日，日机 18 架窜入广西宜山上空，向迁至宜山的浙大扔下 50—100 公斤的炸弹；“(弹坑)直径约一丈五六左右”。③ 复旦大学，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合组的西南联大以及西部地区的重庆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等高校都相继遭日机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沦陷区受破坏的高等学校达 91 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 108 所的 85%，财产损失达 3600 余万元；全国 57.18 万中等学校学生，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高达 50%；全国小学、幼儿园 29.4 万多所，受破坏者达 12.97 万所，占 44%；受破坏的民众教育馆达 835 所。

抗战胜利后各校陆续迁回原址时，但见断垣残壁、满目疮痍，仓促迁校时未及抢运出去的图书、仪器、校具等，或茫然无存、或残存无几。据 1946 年 4 月教育部召开的关于学校复员的几次座谈会上反映的情况，江苏“学校校舍破坏甚大，全部破坏者为数其多”；安徽“战时各级学校校舍大部破坏”；江西“中等学校大都遭受

① 参见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159、161 页。

② 《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员等问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5322)。

③ 《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161 页。

破坏，尤以南昌为甚，未受战时影响者仅三县[①]”北平‘校舍坍漏、校具破烂、图书焚毁偷窃,仪器残缺,损失实居大半”;清华大学校舍颇受损失，图书仪器损失殆尽”。[②]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空前浩劫，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国的图书馆、博物馆是日本侵略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对中国的图书，日本侵略者能抢则抢，不能抢则烧，凡宣传抗日爱国，不利其侵略书籍，统统是其焚毁的目标。

日军占领东北后，以“保护”为名，派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的文溯阁《四库全书》，[③]并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仅 1932 年 3 月至 7 月的五个月中，焚烧书籍达 650 余万册。[④] 日军侵占华北后，华北各地之图书馆藏书凡有抗日、排日(内容)之书籍,皆被没收,易以亲日、反国民政府之书刊。[⑤] 在华东地区，日军挑起上海战火后就开始破坏图书馆，在八一三事变中，上海的中国公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劳动大学、持志学院等校图书馆，均被炸毁或焚毁。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藏书四五十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但在日机轰炸引起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仅有七分之一的藏书，因事先转移，方得幸存。侵华日军不仅劫夺国家图书馆藏书，还肆意搜劫私家藏书及珍贵古籍。日军在南京搜劫公私图书共装 300 多卡车,共计 88 万册。[⑥] 战前全国有图书馆 1848 所,至抗战结束仅剩 700 来所(一说全国受破坏的图书馆达 2118 所),且幸存者亦损失其多。可

① 《关于上海、南京、青岛教育复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13).

② 《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1期 第 164 页。

③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31 日。

④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66 页。

⑤ 《关于北京、天津教育复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14)。

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见，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图书摧残之严重。战后日本虽归还中国图书，但仅占战时中国损失图书的 5.29％。

对于中国的文物，日本侵略者更是垂涎欲滴，贪婪掠夺，大肆破坏。中国博物馆或被炸或被劫，较战前减少一半以上。“一九四四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十八所”。[①] 江浙沪一带的博物馆受害尤深。上海博物馆于八一三事变中为日机所炸毁，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 2000 多件文物被日军洗劫一空，浙江省立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劫掠、损失尤多。我国战时被日军劫掠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 3607074 件又 1870 箱，被劫古迹 741 处。大量无价之宝被日军劫走，甚至有的稀世珍宝下落不明。如，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的作为古人类研究史上重大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即不知去向；江苏吴兴南浔刘氏之嘉善堂被敌寇松井石根劫夺了许多古籍善本和手抄稿本，其中有《永乐大典》残本，为国内所珍藏大典之精品；苏州滂嘉斋所藏之商彝周鼎及怡园珍藏的古籍精品，亦为松井石根劫夺。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

战时我国科研机构的损失也十分严重。一是大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被劫被毁。仅中央研究院 1937 年 7 月至 1939 年 6 月两年间，在这些方面的损失即达当时币值的 73 万多元。[②] 战前至 1935 年 1 月，全国已有学术研究团体、机关 124 个，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有 34 个，除中央研究院外，还有如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洋工学院、南开大学等 10 所高校的研究院。其中，中国科学社生物

①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② 《抗战估计损失》，中央研究院档案，卷号三九三(265)。

研究所新落成的图书馆陈列室等楼房全部毁于兵火。二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各科研机构被迫搬迁，途中科研设施的损坏，这方面造成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三是迁至大后方的科研机关，仍不断遭到轰炸的袭击和骚扰，研究工作时受影响，这方面的损失也是不可低估的。四是为了支撑抗战所需要的巨额的战争经费，不得不大量削减原本就不多的科研经费，如，中央研究院每年科研经费削减了 37％。少得可怜的一点科研经费，只能勉强维持与抗战直接有关的一点应用项目的研究，基础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的研究则几乎停滞。五是中国出版业受破坏极大，许多科研论文或著作找不到出路，相当多的科研成果的手抄稿堆积在研究所中。科研成果不能出版，给科学家带来很大的打击和威胁。上述科研损失的几方面情况归结起来都是日本侵略所造成的。

（二）东部高校的西迁

面对日本侵略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空前劫难，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中国各类文化机构、设施、团体和成千上万的文化人，以罕见的规模纷纷内迁和西移，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重心西移的壮举。

首先是受战火兵燹危害最严重和最直接的高等院校的“南渡”和西移。中国东南部及华北的高等学校，从 1937 年春起就开始内迁。抗战全面爆发后，高校内迁先后出现三次高潮。因战争局势的局部突变而出现的小规模或个别学校的迁移则经常不断。

第一次大的迁移是自 1937 年抗战爆发至 1938 年广州、武汉失守，近一年半时间，共迁高校 75 所。第二次大迁移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至 1942 年上半年，约半年时间，共迁高校 20 所。第三次大迁移是 1944 年国民党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大溃退时，共迁高校 26 所。除这三次集中迁移外，零散迁移或再迁移的高校还有近 50 所。

从东部地区迁到西部地区（主要是大西南、少量的大西北）的高等学校及其落脚处大致情况如下：

迁往陪都重庆的高等院校主要有：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北碚)、三江大学分校,上海医学院、北平朝阳学院、江苏省医政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后改名重庆商船专科学校）、东吴大学法学院、武昌中华大学、湘雅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隶属国民党中央）、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南京戏剧学校、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武汉医药技士专门学校、文华图书馆专科以及南开中学等 22 所。

迁往四川成都的高校主要有：中央大学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医药系、燕京大学分校、北平朝阳学院、上海光华大学分校、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 9 所。

迁往四川其他地方的高校还有 武汉大学(乐山)、江苏省蚕桑专科学校（乐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璧山）、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璧山)、交通大学分校(璧山)、同济大学(宜宾、南溪)、山东大学(万县)、蒙藏学校(后改为国立边疆学校、迁万县)、上海法学院商业专修科（万县）、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万县）、山东药学专科学校(万县)、山东医学专科学校(万县)、东北大学(川北三台)、南京佛学院(又名支那内学院,江津)、正则艺专(江津)、武昌艺专(江津)、南京戏剧学校(川南江安)、山西工农专科学校(金堂)、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北碚)、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泸县)等 20 所。

迁往云南的高等院校主要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上海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同济大学，中法大学文、理学院，中山大学（澄江），武昌华中大学（大理)、广州协和神学院(大理)(以上未注明者均为昆明）等 10 所。

迁往贵州的高等院校主要有：浙江大学（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平越）、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平越)、大夏大学(贵阳、赤水)、湘雅医学院(贵阳)、军政部南京军医学校(安顺)、江苏省医政学院(贵阳)、之江大学分校(贵阳)等8所。

迁往广西桂林等地的高等院校主要有：同济大学（桂东贺县）、武昌华中大学(桂林)、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桂林、桂南龙州)、无锡国学专修馆(桂林、北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5所。

迁往陕西的高等院校主要有：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含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后合组西北联合大学(先后迁西安、汉中、南郑)、东北大学(先后迁北平、开封、西安、川北三台)、山西工农专科学校(西安)、焦作工学院(西安)、山西大学(宜川)、河南大学(宝鸡)等9所。（焦作工学院后又迁甘肃天水）

原本在西部地区创办的高等院校后又再迁移（主要是往西）的主要有 四川大学(由成都迁峨嵋)、云南大学(理、工、农学院分别由昆明迁至嵩明、会泽、自贡)、贵阳医学院(迁重庆)、贵阳师范学院(迁遵义)、西北师范学院(由陕南城固迁兰州)、广西大学(由桂林先后迁桂东融县、黔南榕江）、桂林师范学院（先后迁桂北三江、贵州平越）、贵州农工学院（后改为贵州大学，工学院迁安顺，后迁遵义）、广西军医学院（先后由南宁迁桂西田阳，后改为广西省立医学院,再迁桂林,又分路迁昭平、贺县、融县和三江),陕西省医学专科学校（由西安迁南郑）、国立中央艺术专科学校（由成都、南充迁乐山)等 11所学校。

(三)重要报刊的西迁

报刊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重要报刊的西移是中国文化重心西移的显著标志之一。这里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新民报》等

的迁移分别予以说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其本身就是在延安即西部地区创刊的，兹不赘述。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它筹备于南京,1938 年 1 月 11 日正式创刊于武汉。1938 年 6 月起,日军在徐州会战后不惜一切地投入“武汉攻略作战”。至 8 月,形成中日双方保卫武汉与攻占武汉的激烈的外围作战。为了在武汉万一失守后报纸能不间断地出版，《新华日报》馆在 1938 年 7 月就开始了由武汉向重庆分批迁移。最早一批离汉赴渝的是由报馆总经理熊瑾玎率领的 23 人。他们于 7 月 14 日动身,8 月 1 日抵达重庆。一到重庆就到处奔波、打听，得知《星渝日报》要停刊，就将他们的房屋、设备全部租下，从而得以在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停刊的当天,即 10 月 25 日，重庆《新华日报》就出刊，一天也没有间断，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第二批离开汉口的是杨放之、何云等 15 人，他们原拟去西安出《新华日报》西安版，因国民党阻挠此事未成。后来何云去山西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杨放之等人仍转去重庆。

第三批去重庆的人员是 8 月 6 日离开汉口的，有华岗、戈茅(徐光霄)、林德光等 30 多人。此次任务主要是押运机器和纸张，计有对开印刷机、排字房零部件及 100 多筒卷筒纸,共 26 吨物资。租用两只大木船。原估计两个月可到重庆，后因行走艰难，又遇狂风暴雨，四顾茫然，在洞庭湖迷失方向，到宜昌时就花了近两个月。后为加快在重庆出版报纸的准备，这批人员又分两批行进。因船被撞坏等种种困难，后一部分人员 1939 年 1 月才到重庆。时间虽长点，但长途运输印刷器材、纸张的艰巨任务总算完成了。

第四批是报社大部分人员，由李克农、潘梓年、徐迈进等率领，于 10 月 22 日才离开汉口,包租一条‘新升隆’的小火轮,加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及一些难民共 100 多人。23 日下午，在湖北

嘉鱼县燕子窝遭敌机空袭，轮船被炸沉，有 25 位同志（报馆 16 人，“八办”9 人）中弹或溺水牺牲，还有船员和难民 50 余人同时遇难。[①] 侥幸活下来的同志陆路步行一段，水路一段，辗转多日才至宜昌，然后分批搭船赴重庆。最后到重庆的是 11 月下旬。12 月 5 日，《新华日报》馆为燕子窝遇难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挽词。

最后一批离开汉口的是周恩来指挥章汉夫等 7 人的撤离。他们坚持出了在汉口的最后一期报纸即 1938 年 10 月 24 日的报纸，25 日的报纸实际上也已出来。当时《新华日报》每天都发社论，25 日的社论是周恩来 24 日深夜口授，由陈家康笔录的，题为《告别武汉父老》。[②] 这天的报纸印出了一些，有的散发出去了，有的就贴在大街上，有些则于日军进城后在战火中化作了灰烬，至今尚未找到。周恩来率最后这批同志撤离时，武汉市区已到处听到爆炸声，火光映红了武汉夜空。说明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经驱车一天一夜，26 日到沙市，章汉夫等改乘小轮船去宜昌，然后溯江西上去重庆。周恩来则转往长沙。

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从 1938 年 10 月 25 日一直办到 1947 年 2 月 28 日被国民党强行封闭。它对抗战的发展和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救亡日报》是文化重心西移过程中的又一张十分重要的报纸。该报于 1937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创刊。它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是一张实际由共产党掌握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

随着上海战局的日趋恶化，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在

① 《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1 页。

② 《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